

石硕／著

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

第二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 / 石硕著. —2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220-09726-3

I. ①西… II. ①石… III. ①文化史—研究—西藏
IV. ①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1085号

XIZANG WENMING DONGXIANG FAZHAN SHI

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第二版)

石硕 著

责任编辑	章涛 华青加 仁增才让
装帧设计	经典记忆
责任校对	蓝海
责任印制	李剑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 行 部	
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 盗 版	
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省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30mm × 160mm
印 张	27.5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2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9726-3
定 价	7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内容提要

在西藏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事实：自公元 7 世纪以来，西藏的文明无论在地域空间上或是种族与文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曾在以下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一、在公元 7~9 世纪体现于西藏吐蕃王朝向其东部方向唐朝疆域发动的持续达二百余年之久的强有力的武力扩张，这种扩张使两地间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二、在公元 13~14 世纪，体现于以“帝师”为首的西藏教派势力向元朝京城（今北京）及元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发展，这种发展为西藏宗教势力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三、在公元 15~16 世纪着重体现于藏传佛教由西藏向东北部整个蒙古地域的大规模传播，并取代蒙古原有的萨满教而成为蒙古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宗教。这一结果不但使蒙藏两大民族在宗教上结为一体，也进而导致了二者在政治上的结合——固始汗入藏及以蒙古为依托的西藏甘丹颇章政府的建立。

很显然，西藏文明自身所呈现的这种不断向东发展趋势，乃直接构成了自吐蕃时代以来西藏始终不断地与东部中原王朝（包括北方蒙古）发生广泛而深刻联系的原因。这种联系包括了政治、



经济乃至文化和种族等各个方面。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联系不断积累与发展，正是使西藏最终被牢固地纳入中原政治体系之中并形成西藏今天格局的重要原因。

那么，西藏文明为什么强烈地呈现了东向发展趋势而未呈现大规模向其它方向发展的趋势？或者说西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什么既没有成为印度或是其它某个邻国的一部分甚至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恰恰是最终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此问题在藏学研究领域中无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本书主要从西藏文明的地缘文化背景以及这一文明的自身内涵和客观发展需求角度对历史上西藏与中原关系的形成问题，尤其是形成这种关系的西藏方面的原因和必然性进行了系统讨论。全书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主要不是从外部的原因即不是从中原王朝角度，而是着重从西藏内部的原因，从西藏本身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趋势来讨论其文明的东向发展原因及与中原关系的形成和演变问题。第二，将西藏文明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文化背景之中，即将其放在与之交汇的印度文明、中亚文明和中原文明之中来探讨促成其文明东向发展的客观条件及其必然性。认为西藏文明最终采取东向发展趋势并与中原文明发生深刻联系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它是由西藏文明自身的内涵及其地缘性所决定；二、它是由西藏文明与周边三大文明的关系所决定。本书还着重对蒙藏关系，特别是蒙藏之间发生的特殊宗教联系以及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所起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本书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它不仅对于从事藏学研究的国内外学界同仁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同时也为一切关心西藏并渴望着从较为宏观的高度上去认识和把握西藏历史脉搏的朋友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Capsule Summary of the Book

There exists an outstanding fact in Tibetan history that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has been showing a trend to expand eastward geographically,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since the 7th century. This trend revealed itself most vividly during the following three periods: (1) Between the 7th and 9th centuries, Tu-Bo Dynasty of Tibet launched a powerful military expansion eastward to reach the territory of the Tang Empire. The Expansion which lasted for two hundred years brought the two powers into broad contact and blending with each other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2)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saw a big expansion of the Tibetan religious sects headed by “Tutor of the Emperor” into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now Beiji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under the reign of the Yuan Dynasty, with grea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benefits to the Tibetan religious forces. (3)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ibetan Buddhist spread on a large scale from Tibetan northeastward into the whole region under Mongolian domination and its replacement



of Shamanism, the original Mongolian religion, as the leading religion in the Mongolian society, which not only result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nationalities in religion, but also in politics—Gu-Shihan entered Tibet and the Gan-Dan Po-Zhang regime of Tibet dependent on Mongolia was established.

It is evident that the trend of continual eastward expansion of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itself constituted the direct cause for the broad and profound political, economical, cultural and racial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the central empires in the east (including Mongolia in the North) since To-Bo era. To a great extent, the constant accu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relations led to Tibet's being firmly brought into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and formed what is now the political pattern in Tibet.

Then, why did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show a trend to expand to the east rather than to other directions? Or, why hasn't Tibet become a part of India or some othe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or even an independent nation. but a part of China in its historical process? This is, no doubt, of highly academic value in Tibetan studies. The book focuses on the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 geographical culture,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need of the obj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with emphasis on the causes and thenecessity on the part of Tibet itself.

Two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found in the book:

(1) Not from outside causes, i. e. , not from the causes on the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s, but from the inside causes of Tibet itself, from the need and trend of its ow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auses of its eastward expansion and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are discussed. (2) By placing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in a broader geographical situat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at is, placing it, in a cross-cultural contact with Indian, Middle Asian as well as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which led to its eastward expansion trend and necessity explored. Two causes are believed to lie behind it. First, it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itself and its geographical position; second, by the relations of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with its three great civilizations around it. Besides,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ibet and Mongolia, especially their extraordinarily tie in religion and the important roll of Mongolia in connecting Tibet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as a bridge.

The book is of high academic value. It is valuable not only to the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ibetan studies, but also to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ibet and hope to know it and feel the pulses of its history on a more macroscopic basis.



序 言

从西藏文明的地缘文化背景以及这一文明的自身内涵和客观发展需求角度来探讨历史上西藏与中原关系的形成问题，尤其是探讨形成这种关系的西藏方面的原因和必然性，这一工作前人几乎未曾做过。这是我撰写本书的理由。我想，这可能同时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扩大思路，寻求新的视角并提出和探讨新问题，这本身既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也是学术不断进步的标志。我之所以有勇气用三年的艰苦写作过程来完成此书，正是基于此。此外，本书的完成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近年来国内外藏学研究的繁荣局面，它不但使我在研究中能够充分利用近年发现的考古材料和新近整理、出版的一大批藏文史籍资料，而且也使本书得以广泛地利用和吸收国内外许多新的藏学研究成果，这显然有助于本书质量的提高。所以，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前辈学者及学界同仁们在藏学领域中进行的卓越研究及所提供的丰富成果，同时本书也殷切期望得到前辈学者与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加以修正。

无庸讳言，本书很大程度是一个尝试性的研究成果，作者无意期望它成为最后的、圆满的结论。如果本书的研究题目及其所

选择的视角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乃至争论，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界同仁来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那将是作者最大的欣慰和满足。

石硕

1993 年 7 月 16 日于成都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西藏文明的概念与地域性
- 第三节 西藏文明的归属及相关问题

第二章 西藏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内涵

- 第一节 对西藏高原文明起源的探索
- 第二节 西藏文明的早期发展与古羌人部落的历史渊源关系

第三节 西藏早期文明的布局与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的形成

- 第四节 西藏文明中心的转移与雅隆部落的统一事业

第三章 13 世纪以前吐蕃的扩张与西藏文明东向发展趋势的形成

- 第一节 吐蕃王朝建立初期的周边形势
- 第二节 吐蕃的全面扩张及其东向发展趋势的形成
- 第三节 吐蕃王朝以后西藏文明的进一步东向发展



第四节 藏民族的形成及其多元化构成

第四章 吐蕃时期促成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三大因素

第一节 地缘性因素

第二节 文化的相融性因素

第三节 中原文明的凝聚力因素

第五章 西藏文明向中原文明体系的归属——西藏与元朝政治隶属关系的形成

第一节 13 世纪初叶西藏的内外格局

第二节 谋求权力的竞争——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政治力量的结合

第三节 西藏教派势力与元皇室集团的宗教关系及其政治纽带功能

第四节 萨迦政权模式的形成和影响

第六章 明代——向东倾斜的西藏经济与文化

第一节 帕竹政权兴起及西藏与元明关系的嬗变

第二节 明朝西藏政策的特点与西藏经济的东向性发展

第三节 黄教的兴起与喇嘛教文化圈的东向扩展

第七章 清代：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定型和强化

第一节 蒙古统治西藏所导致的西藏统一政权的形成及与清朝关系的建立

第二节 蒙古对西藏统治权向清朝的转移

第三节 西藏与清朝政治关系的强化和巩固

第八章 清末至民国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演变与性质

第一节 清末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相对松弛及其原因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藏的地位
第九章	对元以来西藏被纳入中原政权若干原因的探讨
第一节	宗教与文化背景：连接西藏与中原的蒙古之链
第二节	寻求外部政治力量支撑的西藏政权模式
第三节	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内外客观条件与必然性
附录：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今天，对于西藏，任何人，无论他属于何种国籍、族籍，也无论他对西藏的现实与未来持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他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西藏是被中国所管辖，是中国版图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藏民族也以其独特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元。这是今天的现实，它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毫无疑问，这一现实亦即西藏今天的格局，并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历史与文化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想要从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来阐明西藏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那么，仅以今天的现实来说明西藏同中国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西藏为什么出现了今天这样的格局而不是其他的格局？或者更进一步说，在自公元7世纪西藏第一个统一王朝——吐蕃王朝建立以来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藏为什么既没有成为印



度的一部分，也没有成为尼泊尔或是其他某个邻国的一部分，甚至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恰恰最终成为了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西藏文明的整个发展史上，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并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果说，在历史上（至少在公元 13 世纪以前）西藏曾经是一个处于自发发展状态、相对自主的民族地区，那么，西藏今天所呈现的格局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西藏的文明自吐蕃时代以来在地域空间上大体采取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轨迹。即这种文明的自身发展是不断地呈现向中原倾斜与靠拢的趋势，并与中原文明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与交汇。这种碰撞与交汇的结果是使西藏及其文明最终被纳入了中原文明的体系之中。也就是说，西藏今天所呈现的格局，正是其文明东向发展的一个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西藏的文明为什么采取了东向发展的轨迹？同时，这一文明又是怎样一步步地被纳入了中原文明的政治体系的？这正是本书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国内藏学界围绕西藏文明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关系形成的原因已进行过许多论述，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专门论述的论著还几乎没有，至少目前尚未见到。而大多是在别的有关论著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系统的研究还非常的不充分。此外，学术界以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存在两个严重缺陷：其一，常常仅满足于罗列若干事实去强调这种关系的存在，而很少去探究形成这种关系的内在原因。即仅满足于说明“这样”，而不去探讨“为什么这样”。其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人们往往更多地侧重从历代中原王朝对西藏所采取的一系列统治措施的角度去进行讨论，而很少从西藏的角度，特别

是从西藏文明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需要来认识和探讨这一问题。显而易见，这种探讨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局限性。与此相反，国外的藏学研究者则常常囿于某种政治和地域的偏见，在他们有关西藏的各种论著中多习惯于孤立地去看待和讨论西藏的文明及其发展问题。这不但使他们对西藏与中原关系形成问题往往涉及甚少，甚至某些人在谈到西藏与中原关系时，还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藏当作中国之外并与中国对等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待，而完全无视元以来西藏与中原政权之间在政治和地缘上所发生的隶属关系。这种明显持有偏见的观点，对于客观、公正地认识和探讨西藏与中原关系形成的原因无疑是一个严重障碍。

自然，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及其与中原关系的形成绝不可能由中原文明单方面的原因所决定。恰恰相反，它更主要的应该由西藏文明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要求所决定，是西藏文明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有鉴于此，本书的研究角度将主要不是从外部的原因，即不是从中原王朝的角度，而是着重从西藏内部的原因，从西藏本身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趋势来探讨其文明的东向发展及其与中原关系的形成问题。也就是说，本书在探讨西藏文明东向发展轨迹的时候，将努力克服以往那种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立场。因为很显然，那种从一开始就把西藏文明视为中原文明的一个附属部分的观点，是极为片面和不客观的。它不但否定了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否定了历史本身。

不过，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西藏文明从它孕育和诞生的时候起，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从地缘上说，西藏文明从一开始就介于西南部的印度文明（或南亚文明）、西北部的中亚文明和东部的中原文明这三大文明的包围和交接之中，并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始终同这三大文明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汇。西藏文明在发展上



最后之所以采取东向发展轨迹并强烈地趋向了中原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它与周边的这三大文明不断发生交汇与碰撞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最终抉择和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与之交汇的印度文明、中亚文明和中原文明这三大文明之中，西藏文明为什么唯独向其东部的中原文明倾斜和靠拢，并最终汇入了中原文明的政治体系？大体说来，这一结果的出现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它是由西藏文明自身的内涵及其地缘性所决定；第二，它是由西藏文明与周边三大文明的关系所决定。在这两者之中，前者，即西藏文明自身的内涵和地缘性可以说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原因；而后者严格说是一种外部原因，它是在通过前者并与前者相整合的前提下发生作用的。因此，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非常紧密的有机联系。寻找这种联系，也许正是客观地说明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原因的关键所在。为此，本书在着重立足于西藏文明自身的客观发展要求和趋势的同时，将努力把西藏文明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文化背景中，即放在与之交汇的印度文明、中亚文明和中原文明三大文明之中来探讨其文明的东向发展及其与中原关系的形成问题。

本书所要探讨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及与中原关系的形成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涉猎面异常广泛，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整个一部西藏文明史。但是，我们相信，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尤其是通过对西藏文明自身内涵及其地缘性所规定的客观发展要求与趋势的解剖和认识，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更加明确、更加透彻地了解西藏今天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内在动因和历史必然性。无庸讳言，本书的探讨仅仅是一个尝试，笔者并不期望它成为最后的、完满的结论。如果本书所进行的尝试和探讨能够引起

人们的兴趣乃至争论，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藏学研究者来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那将是作者最大的欣慰和满足。

第二节 西藏文明的概念与地域性

以往在论及藏民族加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时，通常使用的是“西藏”或“西藏地方”的概念。事实上，藏民族归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不单单是一种地域上的归属，从全面的意义上讲，应理解为是整个西藏文明的一种归属。所谓“西藏文明”，即不仅包括了西藏地域，同时也包括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文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使用的“西藏文明”一词的“文明”概念，并非指狭义的文化，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概念，它包括西藏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西藏文明”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有地域和民族的内涵，也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内涵。

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西藏文明”，应该是指历史上分布于整个藏族聚居区并为藏族所独有的一种高原文明。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则是指以西藏自治区为中心，同时包括了甘、青、川、滇四省区的藏族聚居区在内的藏族文明。从历史源流和民族成分上讲，它自然是指整个藏族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所讨论的实际上是藏族文明的东向发展问题。但是本书之所以未使用“藏族文明”而使用“西藏文明”的概念，这主要是基于三个原因：其一，藏族分布的地域范围和界限在历史上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很难加以具体和明确的规范。与此相反，以卫藏为中心的西藏地域范围在历史上则大体保持了某种相对的稳定性。其二，本书在地域范围、政治历史及文化上主要以西藏为